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docer 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刘海峰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主编 陈文新

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刘海峰 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刘海峰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9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6954-1

I. 二… II. 刘… III. 科举制度—中国—文集 IV. D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4065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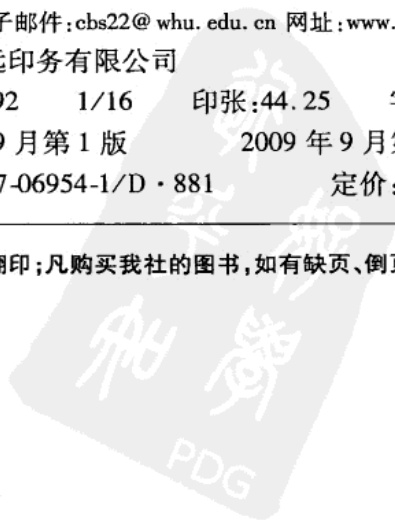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4.25 字数:967千字 插页:4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954-1/D·881 定价:30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傅璇琮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海峰 刘爱松 陈文新 陈水云

张思齐 罗积勇 周 群 赵伯陶

陶佳珞 黄 强 詹杭伦 霍有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

陈文新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①。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②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6页。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①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

^① 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4期。

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①。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思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数。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②。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③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②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多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的状元。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面，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宋代如此，明代如此，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①接下来，赵翼列举了余阙、秦不华、李齐、李黼、王士元、赵琏、周鏊、聂炳元、刘耕孙、丑闾、彭庭坚、普颜不花、月鲁不花、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②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余阙（1303—1358年）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他的朋友蒋良，一次和他谈起国难，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以进士及第，历省居馆阁，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授予兵戎重寄，岂余所堪。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万一不幸，吾知尽吾忠而已。”余阙殉难后，蒋良作《余忠宣公死节记》，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至正辛卯，

^① 赵翼：《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廿二史札记》卷30。

^② 赵翼著、王树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6页。

兵起淮、颍，城邑尽废，江、汉之间能捍御大郡、全尽名节者，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① 在余阙“擢高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元史·秦不华传》在记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秦不华（1305—1352年）时，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秦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足见以《四书》、《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举制度，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泽及明清，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其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他们系统地受过这种教育，耳濡目染，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世人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人们很少注意到，胡适在表面上高呼“打倒孔家店”，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② 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在经历了废止科举、“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儒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由此不难想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儒家经典对社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

^① 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33页。

能。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但正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就个人而言，需要长期的修养，就民族而言，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经由耳濡目染的长期熏陶，价值内化，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既“止乎礼义”而又“发乎性情”，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目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与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并因制度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①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如何才能保证《四书》、《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得以继续发挥？

(三)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1. 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等史传、政书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楨《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

2. 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3000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4集，选文480篇，清文1集，选文290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科举文献，一般读者不易见到，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和阅读。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前4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4年（2010—2013年）内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7册10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而在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之多，更是有目共睹。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者。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8年12月28日

于武汉大学

前 言

刘海峰

1905年9月，在中国古代人文教育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科举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科举制废止后不久，新式教育蓬勃兴起，传统文化礼崩乐坏，社会秩序逐渐瓦解，帝制统治寿终正寝。然而，因为科举制存在时间长久、影响重大深远、内容广博丰厚，因此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整个20世纪，海内外的科举研究此起彼伏，出版著作达300余部，论文3000余篇。进士出身的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① 科举在20世纪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迄今已经有一百余年了。在科举研究进入21世纪、跃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对20世纪科举研究史作一回眸，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科举研究的跌宕起伏

关于20世纪科举研究的回顾在20世纪末已受到关注，我在《“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何忠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②。到2005年科举百年祭以后，又有几篇论文对百年来科举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述评。^③ 这里主要按年代顺序，对20世纪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清末将科举这一封建政治文化制度的基石动摇撬翻之后，整个君主制度的大厦不久

^① 阮元为著名进士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序文，见上海书店1983年版该书首页。

^② 陈高华随后还对何忠礼文作了元代科举研究成果方面的补充，见陈高华《〈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的一点补充》，《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另有一篇论文专门对八股文评价作了世纪回顾，见金宏宇：《二十世纪的“八股”批判》，《求索》2000年第1期。

^③ 刘海峰：《百年回眸“科举学”》，《百年跨越——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历程》，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渡边健哉：《近年の元代科举研究について》《集刊东洋学》2006年10月96号；高明扬、邹敏：《二十世纪以来八股文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郭培贵：《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

也随之崩塌倾覆，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动乱不安的时期。与许多科学问题一样，20世纪最初20年谈不上什么研究，尤其是在清末将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人们还沉浸在科举革废前夕的激愤情绪的余波之中，更是不屑于去拨弄这一“历史垃圾”。20世纪的科举研究始于20年代，至20世纪末，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科举研究奠基期（1920—1949）

科举废后一段时间，最初人们对科举的评价多为片断的回忆和零星的评论，从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到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很少有名人未议论过科举的。就学术研究方面来看，中国、日本、美国学者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举研究。1921年曾在《平民教育》发表《新法考试》的心理学家张耀祥，又于1926年在《心理》杂志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以他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录亲自抄录的24451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人才的地理分布。他还在《晨报副刊》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刊出《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当时“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言科举者“足大来丑诋”^①，一般人皆以考试来代指科举。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按孙中山考试权独立的构想，成立考试院，促进了考试（科举）史的研究。当时，陶希圣就在《春潮》第1卷第2期发表《科举制的意义》一文。1929年邓定人将其在上海《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上发表的连载论文编著成《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由民智书局出版。此书的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唐代的考试制度与诗赋》（《支那学》2卷10期，1922年）^②和《唐代的进士》（《支那学》4卷3期，1927年），东川德治《科举之制》（《东洋文化》12期，1925年），加藤繁《封建与科举》（《东亚》3卷10期，1927年）是日本研究中国科举的早期成果。20世纪20年代外国学者的科举研究论文还有美国学者保罗的《科举制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美国社会学报》35卷2号，1929年），该文由雷震译成中文后，1931年6月在《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1937年之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科举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仅专著就有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出版），方瑜《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山大学1933年印行），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大公报社1933年出版），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卢前《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不少论文发表（约80篇），主要为制度史研究和考订，较有深度的有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和《宋词科考》（《燕京学报》25期，1939年）；较具理论研究性质的有王亚南于

^① 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1925年第1卷第2号。

^② 该文还由张我军译成中文，在天津《益世报》副刊1929年3月30日发表，然甚简短。

1947年在《时与文》2卷14期发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以及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卷1期上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外科举研究专著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论文则以日本学者为多，其中，主要有胜又宪治郎《秀才之辨》（《东方学报》东京6期，1936年），胜又宪治郎《北京的科举时代与贡院》（《东方学报》东京6期，1936年），竹田龙儿《唐代选举的一个侧面》（《史学》20卷2期，1940年），荒木敏一《关于宋代初期的殿试与状元决定的方法》（《东洋史研究》8卷4期，1943年）、《关于宋代殿试形成之事情》（《东亚人文学报》3卷2期，1943年），有高严《元代科举考》（《史潮》2卷2期，1932年），松元盛张《台湾在清朝时代的考试制度》（《南方土俗》4卷第3期，1937年）等，欧美方面，法国学者罗伯特 Rober Des Rotours 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和介绍唐代科举和铨选的专著《唐书选举志译介》^①；另外，1935年在巴黎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乡试研究的专著。^②英文论文有张沅长发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③，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④尤其是邓嗣禹文长达3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是经典性的论文。美国学者柯睿格则在1947年潘光旦、费孝通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同时，发表了一篇《中国帝制时期科举考试中的家庭与才能》^⑤的论文，论题也是谈宋代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

第一阶段的科举研究论著多各自进行，很少产生争论^⑥，但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① Des Routours. Robert. *Le traite des examens traduit de a nouvell histoire des T'ang*. Paris: Librairie Ernest Leroux, 1932. 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科举学著作是法国学者艾特尼·资所作。他于1894年在上海出版了开拓性的法文著作《中国的文科举制度》，1896年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武举制度》，见 Le P. Etienne Zi (Siu), S. J., *Pratique des examens en Chine, Chang-Hai, 1894*. Le P Etienne Zi (Siu), S. J., *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 Chang-Hai, 1896*.

② Li Chow Chung-cheng, *L'examen provincial en Chine (hiang che) sous la dynastie des Ts'ing (de 1644-1911)*, Paris: Jouve&Cie. 1935.

③ Y Z. Chang, *China and English Civil Service Refor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L VII, No3, April, 1942, pp. 539-544.

④ Ssu-yu 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VII (1942-1943), pp. 267-312.

⑤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⑥ 唯一一次直接的争论是何永佺于《观察》4卷11期（1948年5月）发表《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主张科举为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随后吴晗于《观察》4卷14期、流金于《文讯》9卷2期各发表《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加以反驳。

(二) 科举研究中心外移期 (1950—1979)

如果说第一阶段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为研究中心外移期。民国时期的科举研究发展脉络到1949年基本上中断,1950—1979年30年间科举研究属于大陆学术研究的冷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是一堆陈年历史垃圾,即使要去拨弄,主要也是为了肃清其流毒。20世纪70年代以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多,仅出版过3本科举研究专书,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推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鎰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度述录》,商衍鎰作为清末科举过来人中科名最高者,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鎰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一本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晋藩、邱远猷所撰的普及性读物《科举制度史话》,此书篇幅较小,但简明扼要。此阶段大陆学者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也屈指可数,约有10余篇,最多者是吾师韩国磐先生,他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版1954年第1期发表《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在《历史教学》1960年第4期发表《略述科举制度》以及在《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65年第2期发表《科举制和衣冠户》共3篇。其余有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收入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收入吴著《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翦伯赞《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陈直《隋进士科开始于炀帝大业元年考》(《文史》第3辑,1963年),李正中《科举制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等论文。

总的来说,此时期中国大陆将科举视为帝制时代反动的取士制度,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加上当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很少,有些研究成果也未及时发表,如朱保炯、谢沛霖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实际上完成于1963年,但到“文革”后才正式出版。此阶段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受到冷落,明显地处于低谷时期,而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却形成研究热点,仅中国台湾就出版了19部专著,其中较有分量者有科举过来人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此书虽非专门的学术性著作,而是凭记忆和传闻撰述的掌故类图书,但作者博闻强记,有不少是一般史书未载的轶闻逸事,充分反映了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民间的影响。而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的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书名虽与邓嗣禹书相同,却有不少论述颇具独到见解。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则为专题性著作,对一些科举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而其他一些著作,如1954年“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的章群《唐代考选制度考》、1969年广益印书局出版的杨建华《〈摭言〉及其作者考述》、1968年正中书局出版的杨吉仁《三国两晋学校教育及选士制度》、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文学社会》、山西文献社1977年出版的郭荣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朝山西进士》等书也各有侧重。此外，还有朱沛莲《清代鼎甲录》（中国台湾“中华书局”1968年）、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研究》（政治大学1962年）、孙甄陶《清代广东词林纪要》（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等著作。中国台湾学者在此时期发表了许多科举研究论文，远远超过大陆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数量。《考铨月刊》从1951年4月创刊号发表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开始，陆续发表了不少科举研究论文。在众多论文中，以侯绍文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较多且成系列。中国香港方面，1956年贾景德出版了《秀才·举人·进士》一书，赖恬昌1970年出版了英文著作《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①。

此时期日本、欧美也有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出版，代表性的著作可举出日本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中央公论社1963年），以及荒木敏一所著厚实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会1969年）。还有远比中国多的科举研究论文，难以列举。韩国学者十分注重科举研究，1970年宋俊浩便在国会图书馆出版了专著《李朝生员进士试研究》，1976年，李成茂在韩国日报社出版《韩国的科举制度》一书。美国从费正清开始的每一代著名汉学家都在科举研究方面留下痕迹，他们最集中的成果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1963年，Menzel将9位美国汉学家这方面的12篇（部）代表作连同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节选编成一本《中国文官：职位向才士开放？》^②。此书将各位名家的不同观点集中在一起，无异于一次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研究论战的大检阅，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必读书。书后还附有1963年以前发表的与此问题有关的近50篇（本）西方论著，充分显示了西方有关科举研究的雄厚基础。另外，还有傅吾康196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③此时期海外科举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中心已不在中国大陆。

（三）科举研究兴盛期（1980—1999）

20世纪最后20年为科举研究第三阶段，科举研究进入兴盛期，在海外科举研究长盛不衰的同时，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复兴繁荣，研究中心已回归本土。经历过“文革”期间的研究空白之后，最早出版的科举研究专著为程千帆少而精的小册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科举研究论著迅速增加，每年皆有专著出版，其中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

^① T. C. Lai, *A Scholar in Imperial China*, Hkong, 1970.

^② Johanna M. Menzel,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 Boston: D. C. Heath&Co., 1963.

^③ Franke, Wolfgang,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出版社 1985 年)、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 1980 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较有代表性。80 年代共有 19 部科举研究著作面世。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科举研究空前繁盛,仅专门著作便有 100 余部,较为深入细致的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 1992 年)、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奇秀《抡才大典》(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 1993 年)、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 1994 年)、谢青与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 1995 年)、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等等,不胜列举。而且,对科举这个离人们越来越远的制度,总体而言,评价也越来越客观,也越来越公道了。例如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①一书,以清代 114 名状元作为专题研究,“从新的角度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应用中观史学的方法,撷取科举制度中一段时期、一组有关人物进行考察,得出不少有价值、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 1998 年)一书“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细探这种考试选举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不少论著不仅对科举制度作考释和叙述,而且客观全面地评价科举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作出较具理论性的研究成果。

此时期科举研究还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刘海峰在《厦门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发表了《“科举学”刍议》一文,首次提出了“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此后,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科举学”论文,认为“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②;并预言,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必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③《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设立“科举学”笔谈专栏,发表刘海峰、杨学为、廖平胜、易中天、韩升、吴在庆等 6 篇“科举学”论文。李世愉指出:“提出‘科举学’概念,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④到了新世纪,“‘科举学’这一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可”。^⑤“科举学”是考试学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一门专学。各学科的科举研究开始走向汇聚和交融,1998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过“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

①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8 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③ 刘海峰:《“科举学”——21 世纪的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④ 李世愉:《新修〈清史〉与科举制》,《史苑》2005 年第 2 期。作者在文中还认为:“可以预见,若干年后,‘科举学’将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并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

⑤ 郭培贵:《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秋之卷。

实际上集中于科举考试，来自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考试管理部门的许多专家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科举研究见解，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7月出版了《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书后还附有中国考试史部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这次会议为21世纪“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研讨会开了一个先例。

日本学者的科举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进入繁荣期。讲谈社1980年出版了村上哲见《科举史话〈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一书，山川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一书。1982年同朋社出版了左伯富编《宋史选举志索引》，而中岛敏编的《宋史选举志译注》一、二、三册由东洋文库分别于1991年、1995年、2000年出版。日本学者还发表大量的科举研究论文，资料丰富，功底扎实，具有相当的分量，高水平的论文多到不胜枚举。在发表许多科举研究论文的基础上，韩国于1980年召开了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许多韩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研究讨论中国和韩国的科举制，并于1981年由一潮阁出版了收入会议论文和讨论发言的专书《科举——历史学大会主题讨论》。一潮阁还于同年出版了许兴植《高丽科举制度史研究》，将韩国的科举研究推向一个高潮。此后，韩国又出版了曹佐镛《韩国科举制度史研究》（法优社1996年）、朴龙云《高丽时代荫叙制与科举制研究》（一志社1990年）、李成茂《韩国科举制度史》（民音社1997年）等专著。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出版了不下20部的科举研究著作。至今，科举研究论文仍是韩国许多学术刊物不断发稿的一个重要选题。

此时期越南科举研究开始兴起，越南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中心汉喃研究室编的《越南各朝科榜（1075—1919）》，1993年在河内文学出版社出版。阮世龙1995年在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越南儒学——教育与考试》一书，也与中国同类书籍一样，从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两方面介绍了越南儒学的发展。1999年越南汉喃研究院出版《越南登科录版本研究》，对进士登科录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越南学者还发表了不少科举研究论文。例如陈文理《越南科举略考——从开始到戊午科（1918年）》（载《史学家陈文理选集》，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阮俊盛《黎圣宗时期的庭试策文和一些治国安民的重要问题》（载河内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编《黎圣宗——人类与事业（1442—1497）》（河内国家出版社1997年），阮氏兰《文庙—国子监新发现石碑介绍》（载《汉喃杂志》1998年第2期）等。

英文著作方面，美国学者Adam Y. C. Lui 1981年出版了《翰林院：雄心的训练地（1644—1850）》一书。^①1985年有两本英文科举研究著作出版，一是李弘祺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纽约的St. Martin's一起出版了英文版《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一是美国学者贾志扬（Chaffee）在剑桥大学出版了《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德国

^① Adam Yuen-chung Lui, *The Hanlin Academy: Training Ground for the Ambitious. 1644-1850*. Hamden, Connecticut: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81.

学者 Chou Hsiu. Fen Vetter 也于 1985 年出版了《中国科举制中的舞弊与防弊》一书。^① 论文也有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尔曼《帝制中国后期科举考试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一文，发表于美国亚洲学会主办的国际性权威杂志《亚洲研究学报》1991 年第 1 期^②，具有较大的影响。

综观 20 世纪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分散走向综合。

二 20 世纪科举研究的热点和公案

作为一个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科举学”的研究空间非常广阔，但并非没有学术交锋。因研究人员众多、历史悠久、成果丰硕，科举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科举学”的争论问题很多，大至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小至某一著名历史人物的登科年份都有不少争鸣商榷。以下仅概括一下几个影响较大、讨论较为集中的重要问题。

（一）科举起源之争

科举究竟始于何时是科举研究首先要碰到的一个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争论十分激烈、观点相当歧异的一个问题。20 世纪探讨科举制度起源的专门论文已不下 20 篇，还有许多科举研究著作和中国通史、教育史、文化史、制度史著作在有关章节讨论这一问题，各种观点林林总总。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科举始于汉代说，此说以徐连达、楼劲为代表，认为就整套科目体系中有不排除布衣入仕的常科、组织过程具有全国性和统一步调、有取舍留放意义的考试环节三大要素而言，汉代察举与唐代科举基本一致^③；有科举始于唐代说，此说以何忠礼为代表，作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邓嗣禹、俞大纲、张孟劬等人讨论科举起源的基础上，主张科举制应具备士子应举允许“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三个特点，因此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④ 有始于隋代说，多数论者持此观点。但具体而言，隋代说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为始于隋文帝时，宫崎市定认为始于开皇七年，此观点在国际上影响甚大；韩国磐先生从房玄龄卒年推算其进士及第年份，认为科举制创置不迟于开皇十五年或开皇

① Chou Hsiu-Fen Vetter, *Korruption und Betrug in traditionellen Prufungssystem Chinas*. Printed in Germany by Boscolo & Mohr, Karlsruhe, 1986. 《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的作者傅吾康也是德国汉学家。

② Benjamin A. 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Feb. 1991.

③ 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

④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十六年。^①一派认为始于隋炀帝时，其中又有大业元年、大业二年、大业三年、大业四年、大业七年，笼统而言始于“大业中”等不同说法。此外，还有兼顾始于隋和始于唐的“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的说法^②，有认为科举制实际开始于梁朝的说法。^③刘海峰则认为科举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任官的制度，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④由于科举起源问题事关重大，因此争论特别激烈，这不仅是史实的考证问题，而且牵涉对“科举”的定义问题，只有明确“科举”一词的内涵，才能取得对科举起始时间的共识。

（二）科举革废的影响

与科举起始问题不同，科举制的终结年代十分清楚，人们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科举改革与废除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⑤

现在中国学者也意识到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予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⑥科举革废的利弊影响之评价，以往学者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新的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科举制的废除加速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促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⑦科举的废除，使封建体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力都有所削弱，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并开了十年后新文化运动

① 韩国磐：《关于科举制起源的两点小考》，见韩著《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1934年第2卷第1期。

③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④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4页。

⑤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635页。

⑥ 罗志田：《清季科举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⑦ 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广州研究》1987年第11期。

的先河。^① 萧功秦则谈到了当时取消科举这一“休克疗法”的消极后果，认为科举制的急忙废止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一次最重大的文化断裂。^②

废科举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倡科学扫清道路，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不过，在今天看来，其时废科举多少有些匆忙和欠慎，留下的后遗症不小。^③ 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④ 还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不是废于一旦，而是迁延十年之久，最终又以一种貌废而实存的形式延续下去，这就使得名为学校而实同科举的教育制度越过辛亥革命而遗害民国，“读书做官论”始终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连革命也无可奈何。^⑤ 另外，还有不少专文探讨废科举与兴学堂关系问题。由于科举革废影响重大深远，人们的评价争论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三）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科举造成较大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事实还是错误印象，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中外学术界曾作过大量的研究，形成了“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和公案。海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尤为热心。研究表明，唐代能借科举作社会流动的量并不大，但流动的幅度和速度却很大。^⑥ 按美国学者柯睿格根据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同年小录》统计，在可考家庭背景的279名进士中，父祖二代中全无做官的有157人，占56.3%；根据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统计，家庭背景可考的572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331人，占57.9%。^⑦ 萧启庆指出，即使在重视士人家庭“脚跟”的元代，进士出身者中也有不少平民家庭成分者，元统元年（1333年）100名进士中，有35%的进士来自全无官宦传统的家庭。^⑧ 何炳棣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明代，则有46.7%的进士出身于寒微人家，至清末（1822—1904年），前三代无功名或仅为生员者的进士也有35.5%。^⑨ 这种大量的社会阶层流动使中国社会逐渐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逐渐转变为科第

① 郑焱：《1905年废科举论》，《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②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③ 刘振天：《“科举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4期。

④ 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⑤ 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

⑥ 黄富三：《科举制度与唐代的社会流动》，台湾《东方杂志》复刊1968年第2卷第2期。

⑦ E. A.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pp. 115-116.

⑧ 萧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台湾《汉学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

⑨ Ping-ti Ho,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社会。张仲礼的统计是，19世纪35%的绅士为出身普通家庭的“新进者”，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更为有利，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并未向所有的人都提供平等的机会。^① 魏特夫研究了唐代和辽朝的科举后认为，科举确实使一些够格的平民进入官场，但其比例和影响并不大。^②

当代中国学者多数倾向于科举的确促成了较大的社会流动一派的观点，如认为清代状元出身于平民等级的占49%，这个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的基本特征。^③ 从唐至清科举一直促进社会下层向上层的流动，促使社会结构变化其绝对流动比值约在10%~60%之间，平均值约30%。在长久停止科举后的进士考试恢复期或宽松取士期或改朝换代之际，往往社会流动性能达到最高极限，近60%，而一旦科举固定为制度，有比例录取进士，社会流动性将渐趋弱势。^④ 中国学者现也相当重视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但量化分析方面尚未突破何炳棣等海外学者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四）八股文的评价问题

在清末被深恶痛绝而扫进文字垃圾堆中的八股文，现今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当作“文化宝贝”加以研究。作家刘绍棠曾说：“在我的印象，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⑤ 卢前的《八股文小史》写作初衷，便是认为八股文有五百余年之历史，在文学史上自应占有相当之地位，治文学史者固不能以一时之好恶而竟抹杀之。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附录中曾赞扬八股文是“中国文学的结晶”。但在多数人眼中，八股文仍是毫无用处的丑类。

现代对八股文作全面客观评价者，较早的有侯绍文《八股制艺源流考》，发表于中国台湾《人事行政》第21、22两期，其中引述了一些论者对八股文正反两方面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八股文的功用评价较为公允起来。有的论者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应试文体，它有着远较唐人的诗赋和宋人的经义之文更能为考卷的评审提供客观衡量标准的作用，因而宋人的经义之文发展为八股文乃是我国科举制发展史上的一个进展，有其积极意义。^⑥ 以八股文取士除了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以外，还可以划定备考范围，不致漫无边际地学习；从形式上看，八股文可以防止作弊、使评卷标准化、客观化，并减省评卷工作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验出考生的文字基本功，作为一种标

①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55, pp. 182-188, 210-230.

② Karl A. Wittfogel, *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1, 1947, pp. 13-40.

③ 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④ 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⑤ 转引自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文元珏：《明王朝科举制度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准化的考试文体，有其特定的功用。^① 有的论者认为八股文是汉民族文化的积淀，无论精华与糟粕都积存沉淀在那里面。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滇池”，它的底层有非常深厚的污泥浊水。^② 还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八股文与律赋的关系、八股文与宋元时文的关系、八股文与明清古文及戏曲的关系等。八股文曾是中国历史上产出最多的一种文字，然而科举废后因时代需求消失而于20世纪前几十年间烟消云散，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类文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殆尽。^③ 为了让现代人了解八股文，海南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田启霖编著的一大厚本《八股文观止》。而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启功《说八股》以及启功与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另一种《说八股》、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张中行《闲话八股文》等书，都较为客观地介绍了八股文的体式、来龙去脉以及对文学和选拔人才的影响等，使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八股热”。

（五）科举制的功过得失

科举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评价差异最大的一种制度。批判者认为“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④。一些论者还常引用明清时人的说法，认为科举不仅不能选拔和造就人才，而且败坏人才，危害比焚书坑儒还大，甚至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都是八股科举的罪过。肯定者则认为科举是中国各种制度中受人抨击最多最厉害也是最不公正的一个，科举实际上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⑤。甚至认为科举制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西方、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其重要性可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相媲美，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现在多数研究者较为全面客观，认识到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相当重大，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观察，很可能见仁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科举既有维护统一与普及文化的作用，又有压抑个性与阻碍科技的后果，既有澄清吏治与鼓励向学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⑥ 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很难断言其功大于罪或失

① 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余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

② 秦旭卿：《试论八股文的起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

③ 刘祥光：《时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22期。

④ 吴晗：《明代科举情况的绅士特权》，见吴著《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4页。

⑤ [美]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第1卷（4）《中国与远东》，中译本，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96页。

⑥ Liu Haife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 pp. 354-360.

大于得，也很难准确地说是功过参半，这是一个不易用四六开或对半开来量化分析的大问题。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论著较多趋向于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认为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① 科举制的总体评价是科举研究中的最大问题，观点歧异的状态还会永远存在。

学术界为科举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曾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② 沈登苗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指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③

对科举的评价从片面走向公允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关。科举制已经被废止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多年来，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往往深受现实的制约，从对科举不遗余力的批判到主张为科举平反，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构建，与时事、社会背景的变迁密切相关。1905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科举制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根据科举制的全貌，也常常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受制于清末人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并源于对中国考试选才的现实利弊的观察与判断。一百年来，人们据以评论科举制的语境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废科举后的反科举语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建文官考试制度语境，从六七十年代的批判高考语境到80年代的恢复高考和重建公务员考试制度语境，再到90年代的批判“应试教育”和反思传统文化语境，大体可以看作评价科举制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科举制在评价者心目中的面貌也有所变化。“科举学”是一门研究过往考试制度、但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专学，未来中国对科举制的评价仍将处在现实考试所呈现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的影响之下。

以上所举仅是20世纪科举研究中五个较为突出的争论问题，其他如唐代秀才科的存废时间、糊名考试的起始年代、进士科崛起的原因、科举在唐代官僚政治中的地位、科举与唐代文学繁荣的关系、科举与宋代冗官问题、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得失、元代科举

① 葛剑雄：《科举、考试与人才》，见《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第二届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5页。

②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③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的地位、科举是否真正西传、太平天国是否开过女科举及有否女状元、历代科举人数，乃至某个人的是否及第等许多问题都存在直接的争论，使“科举学”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观。

百年回眸，可以看出20世纪科举研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变化多端的。不过，总体而言，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还是清晰分明，趋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其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继续变热，更为学术界所关注，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二是进一步走向理论化与综合化，“科举学”真正形成一门专学；三是评价更为全面和正面，且研究注重为现实考试服务。

三 本书选编原则

本书是《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自然只能选编论文。而且，本书所言二十世纪，不包括既可以算20世纪但通常还是归入21世纪的2000年，因此所选论文的时间下限为1999年。

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有几千篇，其中有大量是水平一般的甚至是重复性的论文，但也有相当数量高水平的论文，至少有数百篇论文可供选择。要在丰富多彩的论文中选出数十篇很容易，但要选好、选得恰当却相当不容易。目前选编的这些论文，虽论题大小轻重不同，也不能说涵盖20世纪科举研究的所有方面，然最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多数已在其中，20世纪科举研究的趋势大致可现。

入选的原则或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水平的论文。学术水平是入选论文的首要考虑因素。我认为高水平的论文，通常是研究的论题重要或宏大，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往往需长时间的投入才能够完成，而且观点新颖、资料丰富，重研究方法，文字严谨或流畅，写作手法还要体现出较高的水平。

(二) 著名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有些科举研究论文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科举学界几乎无人不知，属于经典性的论文，自然在入选之列。不过，有的文章虽很著名，如余秋雨《十万进士》，应该说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毕竟是散文而不属于学术论文，故未选入。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发表后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和争鸣，但认可者较少，因此也不选入。

(三) 原创性的论文。有的论文发表后开启了一个研究领域或引发一系列争论，自然具有特别的价值，例如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便引发了半个世纪以后关于科举起源的激烈争论，便属具有原创性的论文。

(四)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的论文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商衍鏊《科举考试的回忆》一文，不完全是学术论文的写法，但在诸多回忆科场经历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与他另外几篇科举研究论文比较，再三斟酌，还是选择此篇。

(五) 适当考虑覆盖面,也就是适当考虑断代、专题、学科、作者和发表年代的相对平衡。目前所选42篇论文分布并不均衡,如断代方面,宋代较多,那是由于研究宋代科举的论文本身较多且水平较高,而且已经作了一定的权衡,否则比重将更大。作者方面,一人之作以不超过2篇为原则,39位作者中也只有3位作者选了两篇。邓嗣禹仅发表了3篇科举研究论文,但其中两篇均很重要,因此都选入。在1999年之前,李弘祺发表了一系列中英文科举研究论文;刘海峰发表了43篇,是发表科举研究论文最多的学者,各选入两篇论文也有充足的理由。发表年代方面,主要是由于20世纪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不均衡所决定的,90年代发表的高水平论文特别多,因此入选也较多。

(六) 科举研究大家的论文。选编的论文人有名,文也有名最好。不过,有的学者出版了经典性的科举学著作,但却很少发表科举研究论文,或者发表论文的影响不如其科举学著作,如何炳棣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专著的分量,便是基于这点考虑而选入。然而,本书并不是以名取文,有许多著名学者写过科举研究论文,如陶希圣、陈东原、顾颉刚、王亚南、吴晗、翦伯赞、岑仲勉、郑天挺、罗尔纲等,也因故未能选入。

限于篇幅,许多高水平论文只好割舍。备选的论文,或者说不得不忍痛割爱的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水平和有代表性的外文论文。本书所选海外学者的论文都是中文发表的论文或已译成中文者。严格地说,本书只是20世纪中文科举研究论文选编。因为有许多日文科举研究论文,以及一些英文、法文、韩文等文字的论文水平很高,像宫崎市定、荒木敏一、胜又宪治郎、近藤一成等日本学者,贾志扬、艾尔曼^①等美国学者,李成茂、许兴植等韩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科举研究论文,尚未译成中文,因此无法选入。

(二) 篇幅特大或考证性过强的论文。还有些学者发表有高水平的科举研究论文,但由于篇幅过大,本书容纳不下,被迫抽出。如王德毅的《宋代贤良方正科考》,金中枢的宋代科举研究系列论文,魏秀梅关于清代乡会试研究的长篇大论,便属此类情形。

(三) 有的学者现在已很有名,或已崭露头角,也在1999年之前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科举文章,但分量还不够重,所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主要在2000年以后,因此没有选入。21世纪虽然才刚开始8年,科举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产生的科举研究精品论文几乎可以和20世纪80年相比。若干年之后,如果编一本《二十一世纪初科举研究论文选编》,选入论文的分量大概可以和本书媲美。

本书编排的顺序不按科举研究的内在逻辑,而按年代顺序,以反映时代发展的脉

^① 艾尔曼另一篇论文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比目前选入的《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一文影响更大,已译成日文和韩文,但译成中文在《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发表时,有删节且无注释,因此无法选用。柯睿格1947年的那篇论文与目前选入的《中国科举史上的区域、家庭与个人》一文重要性不相上下,时间还更早,发表于1947年,似也未译成中文。

络，以及研究方向与中心的转移。科举研究的进展也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越接近 20 世纪末，研究越深入。如果纯粹按论文质量来选，那么所选论文将更加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为充分尊重学者的观点、表达习惯和文字用法，凡不引起歧义之处，都尽可能遵照发表时的原文。由于出版年代、刊物或文集不同，各篇论文体例不尽相同，因此本书在格式上也无法强求统一，除个别地方按祖国大陆现行注释规范作调整以外，基本上保持原文的风貌。各篇论文之后都附有该论文的原刊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和了解该文。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收部分论文的作者已无法联系或联系不上，请作者或作者家属见到本书后赐告地址，以便奉寄样书。^①

尽管主观上力求全面精到，然以一人之力选编 20 世纪丰富多彩的科举研究论文，囿于个人见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教正。

2008 年立春

^① 本人电子邮箱为：Liuhf@xmu.edu.cn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目 录

前言	刘海峰	1
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	张耀翔	1
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	Paul F Cressey	11
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邓嗣禹	17
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	傅衣凌	27
宋代制举考略	聂崇岐	34
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	邓嗣禹	59
科举与社会流动	潘光旦 费孝通	91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	钱穆	104
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	E. A. Kracke, Jr.	115
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	唐长孺	131
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	杨联升	136
科举考试的回忆	商衍鎏	149
科举制和衣冠户	韩国磐	159
八股制艺兴于宋	侯绍文	165
中国的选举、贡举与科举	曾我部静雄	190
辽金贡举制度	杨树藩	215
宋代教育与科举的几个问题	李弘祺	236
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	王德昭	256
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	傅璇琮	275
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	吴宗国	282
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		
——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	高明士	295
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		
——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萧启庆	337
宋代的举人	李弘祺	361
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	朱瑞熙	376

汉唐科举异同论·····	徐连达 楼 劲	391
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	何忠礼	405
说八股·····	启 功	422
南宋的贡院·····	梁庚尧	452
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	林丽月	475
宋代贡举科目述论·····	张希清	499
“科举学”刍议·····	刘海峰	515
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	宋元强	523
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	何炳棣	537
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		
——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六·····	平田昌司	543
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	龚延明	562
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	艾尔曼	586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萧功秦	610
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	陈高华	619
人累科举·····	何怀宏	630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罗志田	642
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	刘海峰	653
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	王戎笙	667